

July 2020

Transition and Coordination: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s

Yue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Yue. 2020. "Transition and Coordination: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0, (4): pp.145-15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4/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过渡与协调：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

王悦

摘要：18世纪英国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不可靠叙述，与当时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尚未从“传奇”“历史”中完全分离出来的小说文体，在新旧价值观念的混杂与小说功能定位的模糊中，表现出一种叙述形态的不可靠性。本文试图从三个层面分析这种不可靠叙述现象与转型期社会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以此展开历史文化维度上的不可靠叙述研究。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文化语境；菲尔丁；笛福；理查逊

作者简介：王悦，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及英美文学研究。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361005。电子邮箱：Wangyue840907@163.com。本文为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不可靠叙述’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FJ2019C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历史文化维度中的不可靠叙述研究”[项目编号：2072018107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ransition and Coordination: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s

Abstracts: The frequently used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lex cultural context of that period. As a newly emerged narrative style, fiction has not separated itself from romance and history. The fusion of old and new values and the vague self-positioning of fiction jointly resulted in the unreliability in its narrative sty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between the phenomenon of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and the cultural restructuring in three dimens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unreliable nar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Key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 cultural context; Henry Fielding; Daniel Defoe; Samuel Richardson

Author: Wang Yue, Ph. 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focusing on narratolog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ddress: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Siming District,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Email: wangyue840907@163.com This article is sponsored by the Fujian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FJ2019C020) and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XMU (20720181071).

作为当代叙事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的研究存在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两种路径。与修辞方法将不可靠叙述定义为“隐含作者与叙述者规范不一致”(Booth 159)的作者修辞策略不同，认知方法将不可靠叙述视为“在框架理论的语境下，读者用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来解决语意模糊和文本不一致的一种投射”，是“被称之为‘自然化’的解释策略或认知过程”(Yacobi 113—26)。这一方法弥补了修辞方

法对于读者接受层面的忽视，也在与修辞方法的争论与交流中不断修正自身的局限，已经成为研究不可靠叙述的重要理论参照。

近年来，运用认知方法对叙事(不)可靠性进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读者在为“解决语意模糊和文本不一致”进行不可靠性的解读时，自身所携带的历史文化身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进来，它在多大程度上对叙事可靠性的判定产生了影响？以何种方式产生了影响？换言之，历

史文化潮流与不可靠的叙事形态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对此,布鲁诺·泽维克(Bruno Zerweck)在《历史化的不可靠叙述:虚构叙事中的不可靠性和文化话语》一文中作出了详细阐述:“由于不可靠叙述是解释策略的产物,它是具有历史和文化变数的。它反映了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或美学话语在过去两个世纪内许多显著的历时和共时的发展。不可靠叙述因此可被认为是介于伦理学和美学之间、文学和其他文化话语之间的一种现象。而且,如果我们把历史和文化层面置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中,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最终会成为文化研究的广阔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策略。”(Zerweck 151—52)基于这样的理念,泽维克等叙事学家将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是一种叙事手法来看待,提出不可靠叙述研究需要第二次转型——历史和文化转向。^①

这样一种观念的转变成为不可靠叙述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比如:为什么同一个叙事文本的(不)可靠性会在后世不同时代的解读中出现极大差异?为什么在某些时期、某些文化背景下不可靠的叙事作品会集中大量出现,而在另一些历史时空中则非常少见?不可靠的叙事形态对文化思潮的演进产生了哪些推动力?这些问题既涉及读者的阐释认知,也涉及作者的修辞方式。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不可靠叙述的历史文化考察并不是认知方法的专属,而是二者综合的运用。本论文拟从这一思路出发,就18世纪的英国小说来探讨不可靠的叙述现象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可靠的修辞及阐释与转型期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对不可靠叙述的历史文化研究作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传奇”与“历史”之间

在18世纪的英国,传奇文学仍旧在叙事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从法国流入的英雄传奇,在王政复辟后的英国上流社会大行其道。因此,英国早期小说作家大多把与传奇划清界限作为建构自己小说理论的重点,在叙事作品中强调自己讲述的是真实事件,以与讲述虚构离奇故事的传奇相区分。当时以笛福为代表的许多作家在新闻与小说写作中“两栖”生存,极尽细节记录之

能事来证明自己所写的内容是“千真万确”的(Baker 136);许多小说的标题以“历史”命名,如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作者以“真实”历史的记录者而非故事的创造者自居。大部分小说家如理查逊所言,尽管“知道它(故事)是虚构”,却认为维护小说的“真实可靠的外观”和读者“对其历史真实性的信赖”至关重要(McKillop, *The Early Masters* 42)。

事实上,关于“事实”与“虚构”的界定,18世纪的英国与现代已普及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迈克尔·麦基恩(Michael McKeon)在其名著《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中详述了当时许多文人名士对各文类的区分,传奇、传记、游记等叙事类型常常被放在“历史”条目,与现代人认同的历史作品归为一类。这种分类标准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事实”与“虚构”之间界线的模糊,也反映出认识论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关于“在叙事中如何讲述真实的两种不同观点(传奇/历史)之间的对峙”(麦基恩 53)。

在麦基恩看来,小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早期现代社会文化中出现的“类型不稳定”(problems of categorial instability)问题,这一问题背后是科学发展推动下对历史真实性的推崇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论危机。^②当时以法国英雄传奇为代表的传奇文学受到了影响,不再在叙事中单纯追求虚构性,而开始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或然性”(probability)原则向逼真性迈进(Green 285—95);传奇因此被公认为小说文体的前身,在“小说(novel)”的称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奇的、新颖的”与传奇特征的明显关联。但与此同时,小说是以真实历史的姿态从传奇中脱胎出来的,历史真实性与逼真性看似相近却并不兼容,在逼真性发展成完善的现实主义范式之前,历史真实性主张在整个西方小说的起源阶段占据主导地位(麦基恩 95),这种文类类型的不稳定——“传奇”与“历史”在早期小说中的共存与对抗,是导致18世纪英国早期小说中存在诸多不可靠叙述的原因之一。

以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为例。尽管菲尔丁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在小说中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努力,但他同时又无法让尚未发展成熟的小说与

传奇划清界线。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其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身世问题。类似传奇中为主人公设置神秘出身的套路,菲尔丁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份也常常带有一种先天的不确定性——《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阿米莉亚》等作品中都是如此,“出身”问题在情节推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瓦特所说,这一重要性“几乎相当于笛福作品中的金钱或理查逊作品中的道德”(瓦特311)。

在《汤姆·琼斯》中,关于主人公身世的叙述本身就是不可靠的。汤姆·琼斯作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弃儿,被人偷偷放在乡绅沃尔华绥的卧室床上,沃尔华绥在收养这个孩子之前派人去查证了他的身份。查证工作异乎寻常地顺利,嫌疑人詹妮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是孩子的生母;孩子的父亲也在稍后被人指认,经由治安官沃尔华绥的审判,确认是理发匠兼私塾教师帕特里奇。至此,主人公琼斯的身份似乎已经明了——一个穷私塾教师与女仆的私生子。琼斯的出身决定了他不能得到沃尔华绥财产的继承权,不能与邻居乡绅之女索菲娅结婚,甚至不能得到周围稍有身份的人的尊重——但同时他作为养子又深受沃尔华绥先生的宠爱。因此,琼斯的身份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地位的高低与否取决于沃尔华绥对他的认定,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这一身份问题展开:卜利非等人出于嫉妒和利益纷争毁谤琼斯,导致琼斯被沃尔华绥赶出家门,踏上一连串的冒险旅程;与索菲娅的爱情因为等级差异不被家庭接受,导致索菲娅随后也离家出走,琼斯的后半段旅程都在追寻索菲娅,魏斯顿和沃尔华绥等人也出于联姻的缘故齐聚伦敦。

在整个故事的推进过程中,第三人称叙述者一直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自居,声称自己只是历史的记录者而非创造者,如他在谈到沃尔华绥去伦敦办事时说:“他办的究竟是什么事,我可不知道。只是他多年来离家外出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这回却走了这么久,足见事情相当重大。”(菲尔丁8)。这种“不充分报道”(underreporting)^③的修辞大大地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信服于叙述者所谓的历史真实性,然后在“可靠”的伪装背后猛然将读者带入“不可靠”的陷阱里。

这种不可靠性直到读者读完整本《汤姆·琼

斯》后才能意识到。当故事结尾表明琼斯其实是沃尔华绥的妹妹白丽洁小姐的私生子时,读者才会发现前面建立在对琼斯身世误判基础上的大量不可靠叙述。首先白丽洁小姐这一人物形象被颠覆,所谓“白丽洁小姐对于高贵妇女称作贞操的那种美德,一向非常重视,她本人平时操守也十分严谨”(菲尔丁14)原来是尖酸的讽刺,叙述者采用多处这类不可靠的评论来制造白丽洁小姐贞洁、古板的假象,使读者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同样,在詹妮、帕特里奇、沃尔华绥和卜利非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主人公身世反转后带来的人物形象的重构,作者借由不可靠叙述赋予笔下人物更丰富的内涵——詹妮的“好学”比不过“爱财”,帕特里奇看似有罪实则无辜,沃尔华绥一直都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卜利非的恶毒出于嫉妒,更出于对财产的贪欲,等等,这使得我们对于作者给小说定下的主题——“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主人公身世而来的不可靠叙述典型地体现了传奇与历史对早期小说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身世谜团本就是传奇的惯用情节,作者在最后关头揭示身世真相,可以制造信息悬置型的不可靠叙述;另一方面,作者将传奇类型的故事放在“历史”的背景下,使得叙述者的身份发生一种分裂:当叙述者旁观式地讲述“事实”时,他可以被看作他自称的历史学家;而当他刻意隐藏、扭曲事实(即进行不可靠的叙述)时,他又从历史学家的身份中跳脱出来,转而成为虚构文学的作者。历史学家与作家的身份矛盾显示出过渡时期的小说在“如何在叙述中讲述真实”这件事上的犹疑,而不可靠叙述——这一主动“说谎”的叙事手段却恰恰起到了戳破小说的“历史”外衣,还原其虚构本质的作用,客观上推动了现实主义范式的确立。

不仅如此,不可靠叙述在促进小说与传奇分离方面同样功不可没。尽管早期小说作家们大多打着“反传奇”的名号进行创作,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他们的叙事作品中有大量传奇遗留的痕迹。如《汤姆·琼斯》的基本情节是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受到父辈阻隔而被迫分离,共同踏上冒险旅程,遭受一系列艰难考验而终于澄清真相、缔结婚姻,有学者认为其明显受到了古希腊“赫里奥多罗斯式小说”(也被称作希腊传奇)的影响:“它的情节模式通常是由两个已经订婚并进行伪装(通常是兄妹)的恋人的旅程构成。他们的旅程通往一个目

的地,在那里身份被揭露并得以完婚。”(Lynch 16)但菲尔丁只是借用了传奇的框架,以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关照,如杜鹃在研究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时所说:“一方面,他充分借鉴英雄传奇的叙事结构,借助人物的‘英雄’行为展现英国社会的道德状况;而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英雄’涵义的反讽式运用,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道德审判意识。”(杜鹃44)这里的“反讽式运用”,也是以一种不可靠的叙述方式来进行的。如叙述者对于主人公琼斯的不可靠评价,说他“荒唐胡闹、调皮粗野”(菲尔丁119)，“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上绞刑架的”(97),把琼斯放置在一个做“坏事”的角色中——偷盗、欺骗、纵欲等等,然而即使在世俗眼中这些罪名成立,读者却依然能清楚地感到隐含作者对于琼斯的喜爱之情。作者一面站在自然人论的角度为琼斯辩护,^④一面采用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展现世俗眼中所谓道德的说辞,使小说迈出超越英雄传奇模式、深化道德反思主题的关键一步。如同哈特菲尔德所说,菲尔丁笔下主人公的犯罪是用以“反映由‘普通人而非哲学家’所构成的世界中绝对道德范畴的片面,以及自己对道德复杂性的赞赏”(Hatfield 24),这种充满着不可靠叙述的“道德复杂性”帮助小说从传奇的框架和历史的姿态中脱离出来,成为反映时代热点的主流文学样式。

二、“宗教”与“世俗”之间

小说作为一种新型叙事文学样式的发源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将小说兴起的时间认定为18世纪,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叙事文学体现出了迥异于传统叙事体裁的个人主义经验。如他所说:“小说的基本标准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的——个人经验总是独特的,因此也是新鲜的。因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瓦特6)相对于传统叙事文学将“现实”对应于普遍真理、一般概念(7),小说中的现实图景建立在对独特个体经验的反映之上,这种现实主义范式的转化背后是文化思潮的大变革,小说叙事的方式则是凸显这一文化演变的符号表征。

特罗尔采曾指出:“真正永久性的个人主义的成就,应归因于一种宗教的而非世俗的运动,应归因于基督教改革运动,而非文艺复兴运动。”(Troeltsch 328)自16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中,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取消了教会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身份,转而“推崇一种控制范围渗透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形式”(韦伯28),鼓励教徒在不间断的内省中感知神意,确信自己已经蒙受天恩。这种内省使得日常世俗活动被赋予了宗教意义,个人而非教会成为执行神意的工具,从而确立了个体经验在精神升华过程中的重要性。18世纪的小说大量体现了这种宗教自省在世俗生活中的影响,如《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时刻在自己的点滴生活中寻求神意的指引,《帕梅拉》《克拉丽莎》等书信体小说以日记和灵魂自白的形式与上帝对话,都在无形之中将宗教意识与个人独特性的塑造联系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这种带有资产阶级理念的宗教观在18世纪的英国小说中既堂而皇之地掌控了主流话语权,又常常莫可名状地发生与其他情节内容的抵牾,以至于相关叙事的可靠性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例:主人公鲁滨逊·克鲁索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上升期资产阶级的典型,经济个人主义的特性在他身上展露无遗——对金钱的追求是人生的首要事情,重视账簿和契约法则,以商品价值衡量一切人际关系。但在这样一个“经济人”身上,同时还存在着寻求宗教救赎和信仰指引的一面,对上帝的忏悔和神意的体悟占据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心理世界的核心。双重的价值体系赋予了主人公立场不明的叙述声音,以至于他的叙述经常看起来不那么可靠。

比如,小说开头谈及航海一事时说:“除了航海以外,我对别的一概都不乐意干,[……]这种偏执的性格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幸,终于使我未来的生活直接落到悲惨的境地。”(笛福4)这种忏悔在流落荒岛之后更加深刻:“由于当初我坚决不顾自己原来的身份,不听我父亲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劝告,反对他的劝告,我可以说不,是犯了原罪。”(191)鲁滨逊在荒岛上对于原罪的忏悔与他开始认真领受上帝旨意的行为同步,父亲的身份在这里有了上帝的隐喻——违背父亲(上帝)即

是原罪。然而,在主人公离岛之后,他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忏悔:“我自己一向有出海的爱好;加上他再三劝说,终于动心了,就以个体商人的身份,登上他的船,去东印度。”(301)基督徒的身份在“我”回归世俗生活后隐去,坚持经济个人主义的资产者成为主人公唯一的人格标签。鉴于小说叙事的时间晚于被叙述的故事时间,在小说开头时“我”已经经历完所有的事件,那么他有关航海的种种忏悔的说辞是否可靠呢?综观全书,隐含作者对于故事核心——航海一事究竟认定为合理还是罪过,应该还是不应该,竟难以下判断。

瓦特曾把《鲁滨逊漂流记》与《浮士德》《唐璜》和《堂吉珂德》一起并称为“我们个人主义社会里具有独特共鸣的重要神话”,因为它们“展示了主人公对部分现代西方人向往的典型目标一心一意的追求”,“代表或象征了所处社会的某些最基本价值理念”(Watt ix-xii)。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的英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个人主义社会的转型期,基督教信仰对于个人既意味着在世俗生活中服务上帝的新教伦理,也遗留着原始宗教观中对现实欲望的压制和禁锢,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既相辅相成又彼此排斥。鲁滨逊作为叙述者,试图在叙事中整合“自我奋斗”与“精神自传”两个故事,但是在书写“精神自传”时,无数“奋斗”的细节跳出来暴露这种宗教自省的不可靠:他发现岛上可能有野人出现时,“我的害怕撵走了我的一切来自宗教信仰的希望”(笛福 155),当他发现大麦生长只是他抖落了鸡饲料的缘故,“我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对上帝保佑的感谢也化为乌有了”(82);而在书写“自我奋斗”时,精神内省的叙事又阻止了对自我奋斗的肯定——将荒岛生涯解读成上帝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只能推导出航海历险是罪过的结论。

两个故事之间的矛盾使多处叙述中的不可靠显而易见,但问题在于:小说的隐含作者究竟持何种观点?读者该从何种角度理解这种不可靠性?在马克思看来,鲁滨逊并不具有一种虔诚的宗教意识,主人公只是把祈祷“当作消遣来看待”(马克思 恩格斯 86);那么如果隐含作者的立场也是如此,则叙述者关于宗教忏悔的叙述就是不可靠的;反之,如果隐含作者保持了与叙述者的距离[诺瓦克曾通过分析笛福的社会评论等非虚构性作品,指出他的真实道德观与小说中的道德

观并不相同(Novak 198—204)],则小说中世俗与宗教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作者想要反讽的主题,如瑞凯提所认为的,这种矛盾是个体与世界之间复杂矛盾关系的反映,体现了“对绝望的控制和对控制的绝望”的辩证结构(Richetti 67)。

事实上,历来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解读都离不开对其叙事中不可靠之处的阐释——它是站在“世俗”的立场上谈“宗教”不可靠,还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论“世俗”不可靠?或是认为两者都不可靠?抑或作者根本就无意制造不可靠的叙述,所谓不可靠是后世读者阐释的结果?最后一种观点以瓦特为代表,他认为鲁滨逊对两个故事的叙述可能都是相当真诚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笛福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冲突(瓦特 84);读者在小说中感受到的种种不可靠之处,可以解释为作者观点中的“一种未解决的、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冲突的产物”(139)。

瓦特的观点实际上是从认知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不可靠叙述的解读——不可靠性并非从作者的修辞策略中来,而是来自读者对“语意模糊和不一致的一种投射”;作者和读者对于叙事中“不一致”的意识差别,则可以归因于文化思潮的转变。在18世纪的英国,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使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出现世俗化的倾向,但正如施耐德所言,“信仰很少变成怀疑,它们变成的是仪式”(Schneider 98),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宗教与世俗的对立甚至是不存在的。这或许恰恰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中频频出现此类型的不可靠叙述的原因:“宗教”与“世俗”尚未分化成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小说家在进行时代体证的刻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共存的二者作为故事的意识形态背景,而这种共存之下的冲突与差异则需要文化的转型期结束之后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到。

之所以一个文本的不可靠叙述能够出现这么多样化的解读方式,根源还是在于文化语境的动荡不安——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融汇充满矛盾与妥协,作为个人经验发声的小说,其隐含作者无法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到一个稳固的支撑点,这使得读者面对文本中的不一致时,与隐含作者的理解相距甚远。从另一面来讲,文本中不可靠叙述的多义性也是《鲁滨逊漂流记》作为经典的价值所在,它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飘忽不定的距离在取缔了叙述可靠性的同时,准确地传

达成个人主义价值观构建过程中的困惑与两难。

三、“教化”与“娱乐”之间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英国小说兴起的18世纪,文学读者数量相对于以往有明显的增长,其中占据主流的是商人、店主等资产阶级群体,女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⑤相对于古典文学对读者知识背景和审美品位较高的要求,18世纪的小说更倾向于给读者提供一种简易轻松的阅读体验。“它不需要大量的思想劳动,也不需要运用理性才能可以被领会,只需活跃的想象力便可奏效,几乎不必或完全不必增添记忆的负担。”(Croxall 14)读者平民化使小说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休闲娱乐的功能,而书商取代恩主成为作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也使得小说不得不倾向于资本市场,对于大众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趣味的迎合必不可少。

从受读者欢迎的角度而言,理查逊的《帕梅拉》是个非常杰出的代表。这部小说问世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一年再版五次,仿作续作不断,成了最畅销书。女性读者占据了小说受众的很大一部分,尤其女仆读者是其中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群体,用蒙塔古夫人的话说,帕梅拉在婚姻上的成功使她成为“世上所有的侍女为之欢呼的对象”(Thomas, ed 200)。有意思的是,伴随小说的畅销而来的是读者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把它捧上了天,另一派对之嗤之以鼻”,“特别是在女性中间出现了两大阵营,即帕梅拉派和反帕梅拉派。[……]有的人认为那个年轻处女是淑女们该效法的榜样;有人甚至毫不迟疑地在讲道台上推荐这部罗曼司。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虚伪狡猾、精于诱惑之道的女子”(Gooding 109)。

读者态度的分歧与作者为小说预设的道德教化功能不无关系。18世纪的英国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在文化政治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将符合本阶级诉求的价值理念渗透进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小说家们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如理查逊就以“美德有报”作为《帕梅拉》的副标题,企图在虚构文学话语中建构起忠贞、虔信、勤俭等资产阶级道德标准,教导读者(尤其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读

者)弃恶扬善、走上正途。其他作家如菲尔丁、笛福等,也都在小说中开宗明义地强调小说的道德启迪功用,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到清教徒倡导的道德改良运动中来。

一方面是塑造资产阶级新道德观的“教化”需要,一方面是迎合读者大众的“娱乐”要求,这双重属性根植于早期英国小说的发展模式之中,同时也因为彼此的差异在叙事形式上留下了“不可靠”的裂痕。就《帕梅拉》而言,这是一个身为道德楷模的“灰姑娘”的故事。女仆帕梅拉通过与少主人B先生的婚姻实现了阶级跃升,但这份成就并不仅仅是靠帕梅拉的美貌或个人魅力,而是更多地源自帕梅拉的道德原则,集中体现为贞操观。在《帕梅拉》成书的时期,“贞洁不仅是众多德行之一种,而且趋向成为最高尚的德行,它既适用于女人,也适用于男人”(瓦特 172)。这种将抵制肉体欲望视为主要美德的伦理观带有清教主义的色彩,帕梅拉的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认为是正义的、神圣的,是为捍卫基督教原则和社会道德秩序而进行的一场斗争。

可以看出,道德原则对于帕梅拉的意义是双面的——既是用来与B先生作斗争的武器,也是实现自身阶层攀升的阶梯。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都处于劣势的帕梅拉,在与B先生的抗争中主要借助的就是权威的道德秩序。基督教义是她反抗的底气。“我将永远相信上帝的恩泽,它将会保护我,我将依靠这来顶住!”(理查森 74)她时刻不忘在信中援引“全能的主”,占据道德高地来谴责和说服B先生,声称“贞洁将永远是我生命所引以为豪的东西”,“当我去世的时候,它将成为我最大的安慰,那时候全世界的财富与虚荣,将比乞丐所能穿的最低劣的破布更值得鄙视”(69)。以这种方式确立自己与B先生相比人格上的优越地位。

但与此同时,这种将道德原则作为抗争武器的叙述也充满了不可靠性。比如,帕梅拉在叙事中一直坚称要脱离B先生的“魔爪”,但当她终于获得了许可离开,却又借口“职责所在”,在B先生家里逗留多日,不时出现在B先生面前,还为他精心缝制了一件背心(37—40);她对B先生的拒绝永远恰到好处,既不同意做外室又让他明白自己并无其他意中人;更加难以自圆其说的是,她一直以“邪恶”“卑劣”“歹毒”“下作”等贬义词来

评价 B 先生,但当他终于向她求婚时,她却似乎完全忘记了所有的不幸,并马上陷入了“爱情”(292)。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帕梅拉的叙事很容易让读者质疑其可靠性:她以道德为武器是源自高尚与正义吗?还是另有目的?

瓦特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理查逊能够保持相当大的客观性;但很清楚的是,作为一个自觉的道德家,他是完全站在帕梅拉的立场上的,他的小说的最严重的缺陷正是由此而生。”(瓦特 187)换言之,从作者意图的层面来看,《帕梅拉》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规范是一致的,即作者想要通过叙述者展开的是可靠的叙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叙事文本的可靠性可以由此得到保证。事实上,当理查逊试图通过叙述一个因德行而获利故事来倡导道德时,就已经使道德远离了原本的纯粹——它同时包含着抵御物质诱惑与追求现实福祉两重意味,“既是中产阶级抗拒、改造上层社会腐败道德的工具,又是和上层社会达成妥协,得到认可,从而分享社会权力的途径”(胡振明 119)。这种矛盾暗中消解了叙事的可靠性,使叙述者帕梅拉的形象在读者眼中变得可疑,却又同时完美地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于“道德”涵义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帕梅拉》中的不可靠叙述正是这部小说能够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的必要条件,它巧妙地将小说的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融合在一起,反映了这个时代对待道德的微妙态度。一方面,小说中与利益绑定的“道德”顺应了商品社会逐利的特性,迎合了转型期社会中的许多人想要“往上爬”的心理,让读者在道德的外衣下收获一种代入的快感;另一方面,小说又通过给予道德利益回馈证明了道德的力量,客观上起到了引领社会价值导向的作用,以致小说在成为畅销文学的同时还成为“讲道台上的范本”。关于道德充满歧义的、难于定论的叙述或许正是《帕梅拉》最大的魅力所在,它所引起的巨大的争议也是这个时代新旧文化交替的缩影。

如托马斯·凯默所说,这部小说的“人物性格以及动机的论争表象所掩盖的是在传统意识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挑战的时代里更为激烈的冲突与诘问[……]《帕梅拉》不仅是部小说,而且也是意识形态角逐的战场”(Keymer Peter, eds xvii - xix)。传统意识的衰微在小说中首先体现为 B 先

生对于传统道德信条的态度——身为统治阶级一员的 B 先生对于帕梅拉口中的“上帝”“贞洁”“荣誉”态度是轻佻而不以为然的,传统信条已经失去了它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而一直将其奉为宝典的帕梅拉却又在利益兑现后对 B 先生态度大变。那么结局的成婚到底是传统价值信条的胜利,还是掺入利益考量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的胜利?

就 18 世纪的英国小说而言,意识形态的角逐演变与小说叙事的不可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赵毅衡说过:“由于文学最根本的机制是更新语言,创造新的表意方式,它必然破坏既成的语言规范与意识形态规范,文学的生成与释义就很可能成为对既定价值的挑战,就很可能迫使‘意识形态万能’这抛光的表面展开裂缝。”(3—4)这种“裂缝”通常出现在一种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开始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叙述者的世界难以用旧的叙述秩序自洽,因此表现出的不可靠性既是文化冲突的结果,也是推动价值观念革新的力量。

在《帕梅拉》的例子中,“帕梅拉派”和“反帕梅拉派”表面上争执的是帕梅拉的叙述话语是否可靠:她到底是纯洁还是虚伪?根源上则是新旧道德观念的分歧:道德是否可以与功利捆绑在一起?怎么界定道德与功利的关系?《帕梅拉》最著名的批判者菲尔丁就是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出发指责功利的道德观是不道德的;而理查逊,这个身兼印刷业主的文学家,在小说创作中一直有着迎合大众品味(特别是女性品味)的倾向,他给友人的信里说:“如果我过于神圣化,我怀疑除了老奶奶以外,我还会吸引什么人。”(McKillop, *Samuel Richardson* 62)道德教化与休闲娱乐的功能在作者初创的构想中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写作思路在文学史上甚至开创了先河——生成了一种用婚姻来为道德解围的通俗文学模式,足见从中同时满足了读者正义感与功利心的不可靠叙述有它流行的必然;只是随着时代浪潮的推移,休闲娱乐的功能更多地在小说中占了上风,以至于与功利融合的道德叙述似乎很难再引起“不可靠”的争议了。

从叙事的角度综观 18 世纪英国的经典小说作品,不难发现不可靠叙述现象的普遍存在。新

生的叙事体裁——小说从“传奇”与“历史”中脱胎而出,承载着新旧价值观念的交融与分歧,寻找自身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在叙事手法上留下“不可靠”的印迹。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文化的革新与社会的转型,他们笔下的不可靠叙述既反映了时代精神的过渡更迭,也起到了在冲突中协调价值差异、构建新型文化样式的作用。用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话说,“小说是被上帝抛弃了的世界的史诗”(61),那么18世纪英国小说中不可靠的叙述,则是史诗中被赋予文化转折痕迹最明显的篇章。

注释[Notes]

① 关于不可靠叙述的历史文化转型,拙文《〈汤姆·琼斯〉中的不可靠叙述与早期现实主义语境:一种文化叙事学视角》(《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中有进一步的论述,这一研究方向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参见王悦:“《汤姆·琼斯》中的不可靠叙述与早期现实主义语境:一种文化叙事学视角”,《外国文学》3(2019):43—51。

② 麦基恩认为小说的兴起源于解决两种“类型不稳定”问题:一种是“文类类型”,另一种是“社会类型”。前者反映出认识论危机,即如何在叙述中讲述真理的认识态度上的文化转变,称之为“真理问题”(questions of truth);后者体现出如何将外在社会秩序和民众内在道德状态结合起来的文化危机,称之为“道德问题”(questions of virtue)。此处主要探讨的是“真理问题”。

③ 修辞方法的代表人物费伦区分了不可靠叙述的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参见:James Phelan,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49—53。

④ 菲尔丁将琼斯的性格特点定义为“natural gentility”,认为“自然”本身符合道德的真义。自然人论在18世纪的启蒙文化语境中受到追捧,菲尔丁在小说中也将“自然”作为道德的核心词汇。

⑤ 参见: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London: Allen & Unwin, 1939), 445; John Tinnon Taylor, *Early Opposition to the English Novel*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43), 25; Laura Brown, *Ends of Empire: Women and Ideology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ker, Ernest A. *The History of English Novel*. Cabin John:

Wildside Press, 2010.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Croxall, Samuel. *A Select Collection of Novels and Histories*. Farmington Hills: Gale Ecco, 2010.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鹿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Trans. Lu J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杜鹃:《论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Du, Juan. *Ethical Narrative: A Study of Henry Fielding's Novels*. Ph. D. Dis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8.]

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黄乔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Fielding, Henry. *Tom Jones*. Trans. Huang Qiaoshe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Gooding, Richard. “Pamela, Shamela,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mela Vogue.”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2 (1995): 109—30.

Green, Frederick C. “The Critic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French Novel.” *Modern Philology* 3(1927): 174—8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rans. Cao Weidong, et al. Shanghai: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1999.]

Haller, William. *The Rise of Puritan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8.

Hatfield, Glenn W. “The Serpent and the Dove: Fielding's Irony and the Prudence Theme of Tom Jones.” *Modern Philology* 65(1967): 17—32.

胡振明:《对话中的道德建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对话性》。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

[Hu, Zhenming. *Moral Construction in Dialogue: Dialog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s*. Beij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2007.]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Huang, Mei. *Debating the “Self”: Fictions in 18th-Century Englan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Keymer, Thomas, and Peter Sabor, eds. *The Pamela*

- Controversy.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Press, 2001.
-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Lukács, Georg. *A Selection of Early Works by Georg Lukacs*. Trans. Zhang Liang and Wu Yongl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ynch, James J. *Henry Fielding and Heliodoran Novel: Romance, Epic, and Fielding's New Province of Writing*.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迈克尔·麦基恩:《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胡振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McKeon, Michael.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1740*. Trans. Hu Zhenm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cKillop, Alan Duglad. *The Early Masters of English Fic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56.
- . *Samuel Richardson: Printer and Noveli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Novak, Maximillian E. “Conscious Irony in Moll Flanders: Facts and Problems.” *College English* 3(1964): 198—204.
- 塞缪尔·理查森:《帕梅拉》,吴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年。
- [Richardson, Samuel. *Pamela*. Trans. Wu Hui. Nanjing: Yilin Press, 1997.]
- Richetti, John J. *Defoe's Narratives: Situations and Structur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 Schneider, Herbert Wallace. *The Puritan Mi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 Thomas, W. Moy, ed. *The Letters and Works of Mary Wortley Montagu*. New York: AMS Press, 1970.
- Troeltsch, Ernst.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Trans. Olive Wy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31.
- Watt, Ian. *Myths of Modern Individu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Trans.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Ma Qiyan and Chen J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Yacobi, Tamar. “Fictional Reliability as a Communicative Problem.” *Poetics Today* 2(1981): 113—26.
- Zerweck, Bruno. “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 *Style* 1(2001): 151—78.
-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
- [Zhao, Yiheng. *The Uneasy Narrator*.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3.]

(责任编辑:王嘉军)